

本体与诠释

——贺成中英先生70寿诞论文专辑

主编·潘德荣

本体与诠释（第五辑）

Ont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本体与诠释

——贺成中英先生70寿诞论文专辑

主编·潘德荣

本体与诠释（第五辑）
Ont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体与诠释, 第5辑/潘德荣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1-735-2

I. 本... II. 潘... III. ①本体论-文集②解释学-文集 IV. ①B016-53②B08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148 号

本体与诠释

——贺成中英先生 70 寿诞论文专辑

主 编: 潘德荣

责任编辑: 常 工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477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735-2/B·014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跨越国界的世界哲学

(代序)

潘德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之学,体大思精、融会中西,在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为立言。成中英的理论探索涉及了儒学、易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分析哲学、管理哲学等领域,在诸多方面富有建树。特别是他借助于对西方哲学的深刻领悟,将儒家的和谐辩证法和作为真理的本源与整体之本体融为一体,创立了本体诠释学,成为继伽达默尔语言诠释学之后的又一种新的诠释学形态。在我看来,本体诠释学的创立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视作为对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同时亦始开建构中国诠释学之先河;其二为建功。他同时又是著名的哲学活动家,作为“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和《中国哲学季刊》(英文版)的创始人,为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与会通、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成中英祖籍湖北阳新县龙港镇,这一带丘陵环绕,其间富河之水蜿蜒而过,直抵长江南岸。据成中英自述:“按照祠堂序谱,我的

祖先可上溯周代,为文王姬姓之后,但因封地取姓为成。”封地原在今山东省境内,因秦乱而南迁,几经辗转,到了汉中云梦一带,至宋明时,成氏一家已聚族为村。成中英生于传统社会中的耕读世家。其父成惕轩精读古书并治旧学。为求发展,负笈南京,进了新式学校,后又在政府机关任职。1935年9月29日(农历),成中英降生于南京鼓楼中央医院。父亲为他取名“中英”,乃有盼他成为中国的英华之意。卢沟桥事变后,成惕轩举家迁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先后返回南京。1949年12月,成中英随同父亲自成都飞往台湾,考入台湾建国中学就读高中。1952年,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成中英最后能成为哲学家,确是偶然的,而将这偶然性化为现实的,是他有幸遇到了方东美这样一位老师。方先生开设的《哲学概论》,毫无晦涩沉闷之气,深奥的哲理,在诗一般的意境中娓娓道出,如鲲鹏翱翔九天,蛟龙腾游于大海,极目苍穹,登峰揽月,“表现了尼采所称的‘欣赏的最大艺术’和‘卑视的最大艺术’”。方东美所展示的宏伟瑰丽的哲学殿堂紧紧地抓住了成中英的心,他甚至把这一门课的笔记都背得滚瓜烂熟。此后,成中英虽是外文系的学生,却每一学期都选修了方先生的课,同时也兼听一些其他的哲学课程。他的兴趣中心也由外国文学转向了哲学。到了大学二年级,已立志于研究哲学了。方先生在讲授西方哲学时,特别强调柏格森和尼采,成中英就将能够找到的柏格森和尼采的著作悉数细读;其中,令他感触最深的是柏格森的《创化论》;又因方先生对儒道两家的宇宙创化思想有所发挥,故使他对《易传》和《道德经》也有着很深的感受。

1955年,成中英大学毕业,在方东美等老师的支持下,以外文系毕业生的身份报考了台大哲学系研究所,与他同时被研究所录取的有刘述先和傅伟勋。翌年,成中英决定出国深造,去美国留学。

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以光大中国哲学,怀着这样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成中英负笈万里,远涉重洋,踏上了全然陌生的异邦

国土。这是一次前程未卜的远征,他虽然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但对于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地,却无把握。成中英将这次远征看作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即使一无所获,也是一种值得从事的尝试”。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些前辈,如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曾一度在西学的书海中遨游,欲以彼之石,攻己之玉,再造中国传统。他们无不竭其心力,探幽索隐,“为伊消得人憔悴”。把握西学精髓,善善从长,化为己用,是其共同旨趣。这种“先出乎其外”、“后入乎其内”的方法,为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熊十力先生始终立足于传统而吸收西学,是有区别的。

成中英后来回忆道:“(我)发觉自己处在各种历史趋向相互冲突的十字路口上。中国哲学传统正处于这个冲突的中心,他的生命和活力面临着威胁。人们发现它不能应付科学和技术的现代世界,它没有产生出诸如民主和个人权利这类现代西方的价值。然而正是这个传统,在我看来,它不仅是我成长的一部分,而且它也是作为一种人性的形式和一种理性的形式的传统。就儒家、道家而言,它们尽管都富有实用性,却仍然用具有深刻的‘指称性意义’的语言来谈论事物。这个传统的危机,在回顾中或许可以指述为‘传统欠缺指称性意义’的危机,无论是儒家的、道家的、甚至是中国佛学的传统。面对世界的关涉,仅被看作是来自于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正是由于这种危机感,以及对中国传统命运的忧心,才使我来美国寻求西方哲学思想的智慧。”^①

1957年初。成中英进了华盛顿大学,由于申请时条件所限,先念了一学期的英国文学,后转入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他选择的课程主要是现代逻辑、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和知识论等,可以说,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真正接触到当代英美哲学了。第二年,成中英向几所大学提出申请,当时哈佛、耶鲁、哥来尔等大学都给他全额奖学金到本校读书。他几经思考,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他作此选

①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择,主要的还不是因为哈佛大学的盛名,真正吸引他的,乃是在美国哲学界中,尤其是在逻辑和分析哲学中执牛耳的奎因(W. A. Q. Quine)教授。

哈佛大学哲学系是美国哲学的重镇,美国的著名哲学家大都出自哈佛。成中英进入哈佛时,这个重镇的思想领袖是奎因。奎因自己早年亦毕业于哈佛,后赴维也纳深造,深受罗素与卡尔纳普的影响,于逻辑与分析哲学造诣精深。回国后便在哈佛执教,以其论文集《从一个逻辑的观点看》而风靡美国。成中英既然因仰慕奎因而到哈佛,自然对奎因的课程特别感兴趣,所以选修了他当时所开设的全部课程。两年时间,成中英听奎因讲授的“演绎逻辑”、“语言哲学”、“现代逻辑”等课程以及其他的一些语言哲学专题讲座。如果说方东美开启了成中英的哲学心智,奎因则引导他一步步深入到哲学的核心。此间他最大的收获有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一是本体论。我从奎因哲学获得分析哲学最严谨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严谨性,但最重要的是具备一种严谨性的自觉,或严谨性的标准。否则,就无法作出自我理性的批评,严谨性就是形式理性表现。更有甚者,由于从奎因的逻辑引申出来的本体论分析,对物理科学和机体论网络思考,使我更能把握机体论思考的原理,把这一思考用于本体论上,再融合于中国思想之中,就为中国思想找到了一个现代化的途径。同时,也能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建设性的批评。”^①

显然,奎因的思想在成中英的哲学理路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后来讲授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和数理逻辑时,“基本上是以奎因的起点为范式”,而后进一步发展、突破。他自己创立的“本体诠释学”,便是基于对奎因思想的反省,融合了中国哲学与西方诠释学而发展出来的。在哈佛期间,除奎因以外,威廉姆斯(D. Williams)教授也对成中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威廉姆斯是 20 世纪 40 年代

① 成中英:《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载《中国论坛》,第 275 期。

美国的批判实在论者的仅存硕果,他开设的“形上学”和“归纳逻辑”,特别是后者,尤为成中英所叹服。成中英重新对归纳的有效性问题做了完整的考察,证明了归纳推理的统一性,与奎因的知识论遥相呼应。1963年6月,成中英以《皮尔士及刘易斯的归纳理论》(Peirce's and Lewis's Theories of Induction)为题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哈佛岁月,在成中英的哲学生涯中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在哈佛的五年中,我的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锻炼,不但使我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感到其心脏的跳动,而且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哲学既不同于文史,也不同于科学,但却与这两者不离不杂,有其严肃的理知性格。无论在方法学上,还是在本体学上;无论在知识论上,还是在价值论上,我都找到了哲学思考的标准,使我以后的哲学生命的追求有规范可循。但这也使我走上了一条更孤峻的道路。我当时觉得,我可以奉献于中国哲学的就是这一颗哲学的赤子之心。”

经过这一番脱胎换骨的锻造,成中英已具备了作为一个哲学家所必备的素质,同时,他也并未沉迷于西学而不知归返,在这一点上,他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清醒的意识:重建中国哲学。

二

谈到中国哲学,常使人联想起那些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因时间的磨损而斑驳陆离,残缺不全,并因之而周身发出神秘的光芒。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每一文物都是一篇“本文”,当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力图透过这神秘的迷雾,破译它们所携带的“密码语言”时,诠释的哲学家却从这些历史的“遗骸”中看到了它们在当代所展现出的意义。历史不是指已经过去的一切,它乃是我们当代传统的生命力之源泉。如成中英所言:中国哲学像一棵久经风霜的老树,从外部看或许斑痕累

累,但它的内在生命力却经久不衰。你越是深入思考它,你越是深入关注它,它就越有吸引力,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在根源是深植于人性的内在根源中的,这就是中国哲学称之为“道”的宇宙生命的内在根源。

遗憾的是,这棵富有生命力的老树却未焕发出勃勃生机。显而易见,西方哲学之树硕果累累,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姿的哲学体系,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则显得营养不良。如是,这样的一种后果几乎是必不可免的:一方面,我们在大谈特谈西方哲学,而另一方面,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哲学是否存在都成了一个问題。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两百年前说过,“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赞颂中国哲学”。但是,无论是他的先驱,还是后继者,对于中国哲学是不甚了了的,犹如雾里观花。他们谈论的是中国人“所罗门式的智慧”,中国的风俗礼仪、用兵谋略、治国之道,而对中国哲学却很少论及。现在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在西方某些大学里,已有一些学者讲授中国哲学,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以笔者就学的德国鲁尔大学为例,中国哲学的课程是东亚系、而不是哲学系开设的;授课教师不是哲学教授,而是汉学家。说到底,中国哲学并未在我们的西方同行那里获得完全的认同。

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西方的汉学以前大都侧重于中国的文物制度和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并不重视中国哲学。这原因之一,是大多数汉学家本身未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较早时期的汉学家不少是曾居留中国的传教士,有着自己的宗教背景,往往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思维传统,难以深入到中国哲学思维的核心。再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学者囿于自己的思维传统,殊难理解另一种不同内涵的哲学智慧、风格迥异的语言表达方式。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确是意义深远,而且,

中国传统哲学只有与现代化相连接才能显出其深含的智慧^①,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此乃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基本前提。成中英从《易经》研究中发展出中国现代管理之道,可视为这一方面的典范^②。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就其内容而言,我们应完善中国传统的价值本体论,并以此反观当代社会,阐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西方哲学发萌之初,理性就得到了肯定,从理性的发展推演到知识宇宙的建立所形成的巨流,也就是西方科学发展的潮流。西方科学的成长过程亦可借此得到说明。当然,这种知识化、理性化的思考,虽然一方面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扩大了人类的视界,另一方面却促成了人类社会目标的冲突、生活意义的失落以及生命价值的空虚,由此而引发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哲学,是对宇宙价值、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深远的肯定与体验,就此而言,它可对西方哲学起到补偏作用;

二是就其形式而言,中国哲学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使传统的東西转化为现代生活中的现实^③。这种新形式不完全是指西方哲学固有的表达方式,按照成中英的理解,这种新形式由两个方面构成:“逻辑的方法和现代生活的辩证法”^④。严密逻辑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建立系统的哲学体系,现代生活的辩证法则能使我们把握时代的精神。

成中英指出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途径:比较→批判→重建。详言之,任何哲学都以其自身的经验为基础,因而都有其自身局限,就此而言,比较研究对于所比较的双方之发展都会有所助益。

① 参见成中英:《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台北,联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页。

② 在成中英《C 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一书中,将《易经》之学理化为现代的管理、决策准则,可以说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管理理念。

③ 参见同上,第 12 页。

④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 111 页。

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言,借鉴西方哲学充分发展了的理论理性以检讨、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乃势在必行。但批判并非是消极性、破坏性的,“是以反省经验及思考为基础的理性活动”,它的目标就是重建。批判的结果若不是重建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批判^①。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由中西方哲学的融合而产生的新的力量,一种新境界。从根本上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融合中西方哲学的哲学重建,在其中,严格的语言和逻辑方法代表了西方哲学知识体系的科学精神,而注重人生意义和价值目标方面,则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精髓。正因如此,重建的中国哲学,因其汲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而具有了某种世界哲学的意义,并因其具备了现代的表达方式而能为西方人所理解、接受,在这两层意义上,使中国哲学成为一种世界化的哲学。

这便是成中英的学术生涯所孜孜以求的哲学理想,并为实现这一宏伟的构想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表现出一个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黑格尔曾言:哲学是密纳发的猫头鹰,直到夜幕降临时才开始飞翔。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哲学是一种反思,只有在灿烂的阳光下发生的一切已经逝去,哲学家们才能通过反思来解开瞬息万变的现象之谜。但是,这样的哲学总使人感到缺少一种使命感。当晨曦初露、万物复苏之时,哲学家们却只能静静地观望着,甚至连观望也不行,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是为避免被“现象”所惑、让感性蒙蔽理性的光辉,竟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然而,我们相信,在哲学家身上最可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基于现实,又必须超越于现实,正是在这种超越中,将自己的使命感具体化为面向未来的目标。哲学家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着社会的发展进程。成中

① 参见成中英:《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2~20页;《知识与价值》(李翔海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258页。

英就是这样的哲学家,他对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有着深刻的领悟:“……我已深深自觉到自己的哲学生命中有一种内在的冲力,要自己切实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以为真正光大中国文化慧命(即人类文化和历史的使命——笔者注)与中国哲学的基础。那时我也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我必须从西洋哲学灵魂深处来肯定中国哲学的意义,尤其是普遍意义。”^①

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广泛地开展着世界性的交流与合作,世界也在日益整体化,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已被称为“地球村”,迫使我们立足于“整体的世界”来考虑问题。在哲学上,要加强中西方哲学的沟通,互相取长补短,以它山之石攻玉,建立一种“世界整体哲学”,引导人类共同走向大同世界。成中英的哲学思考,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折光。

三

早在明末清初,有识之士对中西方之会通的重要性,就已有所觉悟。徐光启尝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欲求会通,必须翻译。”当时运抵中国的西方书籍已达 7 000 余部,包括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方面,曾有计划集中数十人将其系统翻译成中文,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无论如何,这一计划只能被视为“引进”,还谈不上真正的会通。其后近三百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与文明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态,持彻底排斥态度的虽不乏其人,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希望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将之作为工具而达到“以夷制夷”,用哲学的术语,便是“中体西用”。

在哲学的意义上,中西会通与融合始于当代新儒家。然其初旨,还只是中国哲学的“输出”,即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1957 年唐君毅访美,与旅居美国的张君勱会谈,言及西方人的汉学之肤浅,

^① 成中英:《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载《中国论坛》,第 277 期。

尤其对西方人以凭吊古迹、欣赏文物式的姿态来研究汉学深为不满。鉴此,张君劢提议,由唐君毅起草,再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修正,最后 4 人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中国文化与世界》)一文。1962 年 8 月 26 日,由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发起,联络在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讲授儒家哲学的华人学者,成立了“东方人文学会”。这一学会是当代新儒家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学术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华人哲学家。它对推动新儒家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在学术探讨方面,与之并进的有“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64 年初,召开了第 4 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老一辈学者方东美、唐君毅等人,年轻一代的学者成中英、刘述先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为便于联络,他们开始编制海外中国哲学家通讯网络,意识到分散在各国的哲学家进行密切的直接交流之必要性。

所有这一切,为成中英创立《国际中国哲学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加第 4 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时,正是成中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第 2 年。虽说是初出茅庐,然在思想上已趋于成熟,他敏锐地觉察到哲学家的联合与哲学思想的交流的重要性,心中开始萌生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他自述道:“自从 1964 年第 4 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以来,我就知道,重要的是把个人集合在一起。但那时,我们更强烈地感到需要聚拢思想。人和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没有人就不可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有思想的人。就中国哲学而言,中国哲学传统内部的危机是这样的,它需要外部的水源强根富干。此外,从我们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解,深深感到,西方传统有必要接受外来的刺激。我觉得,西方哲学确实也有内部的危机。虽然它是一种不同于中国哲学的危机。西方哲学总是经历着危机,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是通过接受危机的挑战发展和兴盛的。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却更多地陷入了维护历史

遗产的局面。”^①

为聚拢思想,成中英开始筹建《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直到1972年,《季刊》才得以面世。它的创办预示着一一种新的觉醒,意味着在对西方哲学反思的同时,探索着中国字关系的内在生命之发扬光大的一种新形式。它通过哲学的对话,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并且,还试图将中国哲学移植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区域,因此,它的目的是双重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中国哲学的世界化。这一杂志受到了哲学同道“虽然缓慢而稳固的支持”,在它的影响下,团结了一批中国哲学的学者,在美国更有组织、更广泛的推动中国哲学的研究与传播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75年,成中英发起创办了“中国哲学会”。

中国哲学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东方人文学会的重大区别。如果说,东方人文学会只是一个国际性的华人团体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会乃是真正国际性的,它的成员包括了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还包括了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乃至研究西方哲学的非西方学者。所探讨的问题也不局限于中国哲学,当然更不局限于儒家思想,中国哲学会对某些世界各种哲学所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方法、价值和人类存在等问题,都展开过广泛而有深入的讨论。

1978年,第一届“中国哲学会”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美田大学召开,会议由唐力权主持,成中英为合作主席。(在此后的数届会议上,都各设一主席和合作主席,合作主席一直由成中英担任)唐力权建议“中国哲学会”更名为“国际中国哲学会”,由成中英负责更名。唐力权强调“国际”一词非常有意义,这不仅是指学会的基础是“国际”的,而且它的宗旨也是“国际”的。成中英指出:“它(指国际中国哲学会)的目的是以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建立一种为人类普遍关心的生活形式和思想方式。它试图把诸哲学社会

^①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112页。

的伟大联合(大同)推向世界,以便为全人类的和谐与团结提供一盏领航之灯。”^①

国际中国哲学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至今召开了 12 次会议,除了第 2 届与第 3 届会议之间间隔了 3 年外,其他历次都如期召开。

由于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学者为之所吸引,参与其中。它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世界各国为数不少的哲学家们的理解与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再次证明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它在当代的社会价值。通过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的传播,对西方哲学构成了一种挑战,同时,它自己也面临着西方哲学的挑战,这种双向的挑战,会使双方都开拓出一个新的视界与新的境界,推动自身的发展,并在这种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融合。其结果,便是世界整体哲学的形成。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双方都消融了自己的特点而达到无差别的统一,相反的,世界整体哲学的形成是以各种不同传统的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为前提的,真正的世界整体哲学是包容了诸种哲学的“和而不同”的体系。这便是成中英的哲学理想,他显然对自己的这一理想是满怀信心的,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创立,是向着这一理想而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交流、沟通、融合中西方文化,现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哲学的反思,乃是这项事业的基础,人们并不是在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早在当代新儒家形成的初期,包括成中英的老师方东美在内,就已经开始了哲学的反思。他们试图借助于西方哲学来完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成中英的贡献在于,他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就是世界整体哲学。它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传统的本体论与西方的方法论之融合。这一特征表明,成中英是立足于全球的观念

^①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 114~115 页。

来思考哲学问题,以建构哲学体系的。如前所述,世界整体哲学乃是多元一体的体系,因此,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各种哲学体系并不会由于“融合”而化为无,相反的,世界整体哲学的发展,依赖于它所内含的多元之发展,而整体之发展也会反过来推动多元自身的发展。出于这样的构想,成中英思考问题的中心,较之前两代海外华人学者,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在容闳那里,其主旨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教育;在胡适,已演为全盘西化;到了成中英这一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才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他将容闳、胡适等人单方面的把西方文化输入中国转变成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双向运动。不惟中国人应了解西方,而且西方人亦应了解中国,以达到真正的互利互动。为此,他投入了很大的经历,进行文化传播的组织工作。他所创建的“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易经学会”、“国际本体诠释学学会”、《中国哲学季刊》等等,实际上都有双重使命:学术探讨与文化传播。他的努力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哲学家来研究中国哲学。

四

西方哲学源远流长。古代希腊,哲人辈出,哲学体系纷呈,志在穷极宇宙奥秘。方东美曾说哲学思想之产生出于三种动机:“一,蓄鄙视之意,二,存质疑之心,三,具求知之诚。”^①他的说法不无道理。但细细审之,西方哲学之缘起与展开,当是以“求知”为主线。西方哲学在中世纪曾一度衰退,于文艺复兴后再度崛起,一方面,知识理性借科学之力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知识理性又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如此相互促动并进,使科学的理性主义成为一代时尚。西学东渐后,中国的一些学者亦对此深表赞同,胡适这样表白,“我们也许不轻易相信上帝的万能,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

^① 《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5 页。

万能的。”^①他所说的“科学的方法”就是理性主义的方法。西方哲学本质上是以方法论为核心的,正如成中英所分析的那样,“西方哲学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取向,希腊人素来就是对知识理性执着地追求。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连,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一方面,方法产生了新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知识系统又反过来限制了方法的运用。当知识限制了方法时,就应对方法进行反思,设法创造出新的方法。因此,西方哲学中的方法意识非常强,每一个哲学家都以方法的鉴定开始其哲学思考的。例如,苏格拉底的哲学——一种定义的方法来鉴定各种概念;柏拉图把这种方法发展为超越辩证法,把辩证法看作是理念的发展;笛卡儿提出了怀疑的方法;康德主张批评的方法;黑格尔强调精神主体展开的辩证方法。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对方法的寻求。”^②

但这并不是说,在西方哲学中没有本体论传统,只不过其本体论比起方法论,缺乏锐意进取的朝气,未能突破唯物、唯心和心物二元的三分天下之格局,无论是哪一种本体论,皆不能将人与宇宙视为一交融互摄的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指责以往的哲学家忘却了“存在及其意义”,没有本体论。如果海德格尔所言是正确的,那么西方本体论之匮乏只在海德格尔和怀特海的形上学体系里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西方哲学的发展,在方法论上的成就卓然,而疏于本体论,这固然有其片面性,但它的意义决不可低估。方法论毕竟是哲学探索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或者准确的说,是其主要方面之一。毋庸置疑,这一方面的探索主要是有西方哲学来完成的。故欲从整体上了解哲学,西方哲学不可不察;欲了解西方哲学,其方法论不可不察。西方哲学发展至现代,可以说是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收获的季节。各种学说接踵而至,斑驳陆离,令人目不暇接。厘清其渊

①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13页。

② 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3页。